

人性与神性交织的生命赞歌

——评红柯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及其大漠书写

■刘小波

红柯最新作品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，仍采用复调式叙事结构。小说的一条故事线索是吴丽梅与徐济云的爱情故事，另一条是徐济云的学术成长史及其带领研究生研究皮影艺术的故事。不同于以往作品，红柯此次创作在延续以往神性写作的同时，加入了对现实的深度描摹，从而以冷夸张的叙述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，他以自己的工作环境为切入，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揭露客观真相，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学术界在体制化、功利化驱动下的种种丑态。

红柯的作品聚焦西域大漠。正是在那儿恶劣的生态环境中，生长着生命力极旺盛的杨树、柳树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群，以及生生不息的普通人。从《西去的骑手》《大河》《乌尔禾》《生命树》《阿斗》《好人难做》《百鸟朝凤》到《喀拉布风暴》《少女萨吾尔登》以及最近出版的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，都具有这样的重复性叙述。

小说的阐释，一定程度上通过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。对作家的解读，也可从重复这一角度展开。综观红柯的创作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复，分别是非自然叙事、对自然的崇拜、音乐的合理使用。

非自然叙述

艺术符号具有规约性，创作中又须不断打破规约，完成自我更新。小说创作中，这种反规约主要通过非自然叙述等手法来实现。主流叙事理论建立在模仿叙事的基础上，即叙事受到外部世

界可能或确实存在的事物的限制。而当代叙事学发展的新动向则是反模仿的极端叙事，即非自然叙事。于红柯而言，特殊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想象，他的作品恣意汪洋，亦真亦幻，具有神性写作的一面。西域是多种宗教交融之地，民间想象力极为丰富，这也直接影响了红柯的创作。

红柯想象力丰富，其作品具有神性，很多诡谲的叙述打破了自然规律。《乌尔禾》中的海力布被塑造成具有神性的英雄，他懂鸟语，与蛇精和谐相处等等，都是非自然叙述。《喀拉布风暴》中关于地精以及武明生家族，作者也大胆地描写了大量民间的性故事、性传说和性知识。这些非自然叙述甚至引起读者关注与质疑。

这样的写作，某种意义上与读者好猎奇的阅读心态有关。小说须有故事，情节越离奇，读者越易走进故事甚至产生代入感。虽然许多作者强调并未猎奇，事实却并非如此。其实，这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。很多传统文学具有非自然叙事的特质，如志怪小说、神话等，包括《搜神记》《聊斋志异》《西游记》，就连《红楼梦》也有太多的情节超出了日常生活。再则，作家受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的滋养，西方大量作品采用非自然叙述，如《变形记》将人异化为甲壳虫，波伏娃的《人都是要死的》和伍尔夫的《奥兰多》等都属于非自然叙述。非自然叙述是艺术对现实的提炼、夸张和变形，能使作品更具张力，更具文学性和艺术性。



自然崇拜

在红柯的作品中，动植物与人一样成为作品的主体。大漠里的胡杨树、红柳等植物，白羊、骆驼、狼等动物以及沙漠、盆地和河流等无生命的自然物，都是作者不遗余力描写的对象，如《西去的骑手》中的马，《大河》中的熊，《乌尔禾》中的羊以及《生命树》中的树。在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中，比胡杨更有生命力的红柳成为“太阳深处的火焰”，这也是红柯这部新作的命名来源。西域大漠的人和事，包括飞禽走兽、草木砂石，都与主人公共存共荣。在山川、河流、大地以及动物之间，人类找到了生命的根基。

《喀拉布风暴》中的风暴，这一自然现象可谓小说的另一主人

公。风暴不仅具有摧毁性和破坏性，而且具有生命力，是自然界检验生命韧性的工具。在大西北沙漠瀚海中，肆虐的黑色沙尘暴被称为喀拉布风暴，它冬带冰雪，夏带沙石，所到之处，大地成为雅丹，鸟儿折翅而亡，幸存者衔泥垒窝，胡杨和雅丹成为奔走的骆驼。而在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中，作者对塔里木盆地的描写已完全融进小说。红柯不止一次说过，景物也是他作品的主体。

对于离太阳最近的羊的描写，则在红柯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。包括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对放生的描写，这一切，都表现了对生命的敬畏。

对自然的崇拜，也是对生命的赞歌。《大河》是生命不死的颂歌，《西去的骑手》是有关英雄和血性的史诗式长篇，《喀拉布风暴》表现生命面对苦难时的坚韧与顽强。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中，红柳就是火焰，照亮万物的生命，包括民间艺术皮影，作者将各色人等编进故事置于西域风沙的洗礼中。神性的背后，是现实的书写，对历史的书写，对一代边疆开垦人的书写。

音乐元素

小说不乏音乐叙事，当代小说尤为明显。音乐可充当叙事元素，推动情节发展，与小说文本形成张力，深化主题。音乐还能彰显风格，强化情感。

红柯的小说中有大量的音乐元素。《生命树》用歌曲推进叙事，

具有蒙古古诗《江格尔》的风味。小说穿插两种歌曲，一是蒙古古歌，这是关于灵魂的音乐。蒙古奶歌在文中多次出现，牛禄喜和马来新的友谊中有奶歌，马燕红在挤奶的过程中悟出了佛性，其间多次响起奶歌。另一是时代流行曲，现代文明在大草原的印迹，也是王蓝蓝、陈辉等人生活的侧影。

《故乡》的情节同样以歌曲推动，故事极简单，情感则极浓郁。故事主要讲述回乡探母，情感主要通过歌曲来抒发。歌曲《我的母亲》在文中反复出现，浓缩了太多的情感。作者把母亲的爱和泉水相提并论，既洗涤了作者的衣裳与双手，更洗涤了作者的灵魂。文中歌声第二次响起，是大学生周健在周原老家时，《大月氏歌》与《我的母亲》接连奏响。当他默默记下这首古歌时，勾起了对家乡的无限思念。歌声第三次响起时，天空中的白云消失，仅留孤零零的鹰。此时的情感又具有另一层色彩，《大月氏歌》是草原的历史，是人们心中最隐秘的伤痛。

红柯对民间音乐情有独钟，搜集了大量民间歌手专辑。这种音乐情怀延伸到创作中，音乐被广泛运用于小说中。除了体现作者的立场，音乐还有助于抒发满腔的情感，凸显浪漫情愫。红柯因其作品流露出浓郁情感，而被冠以浪漫主义者。

红柯游走于西域与关中，勾连起来的是对生生不息的人间万物的颂赞。红柯的根深植于大漠，大量事物、人物、传说、故事、情节、情感等已然书写、反复呈现，小说结构、叙述手法等技法层面也有诸多延续，后期创作除了笔力的进步，融进了更多的人文思考。总体而言，红柯的小说是对生命的敬畏，对生命力的讴歌，对苦难的隐忍，对人性的歌颂，对西域大漠的独特情怀。神性中有人性的呈现，是神性与人性交织的生命赞歌。

作家的责任与担当

——读冯骥才《激流中：1979—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》

■刘小兵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中国文学步入了新时代。当时的文坛，王蒙、刘心武、冯骥才、张贤亮、陆文夫等一大批作家，以直面现实的真诚和勇气，满怀仁爱关切的济世情怀，纷纷推出精品力作，造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。作家马原认为，这是中国文坛的一段“新时期文学”。遗憾的是，追溯那个时期的文艺作品不多。好在冯骥才新近推出的随笔集《激流中：1979—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》，多少填补了这种缺憾。曾以《三寸金莲》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《神鞭》等作品驰骋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的冯骥才，尽管近二十年来将主要把精力专注于民间文化的挖掘和保护，但在他的心中，始终对那段“新时期文学”感触良深。在一次参观古罗马遗迹时，作家由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联想到中国的“新时期文学”，于是，在喷薄的创作灵感下，便有了这本十二万字的随笔集。

这是一本非虚构的写实作品。冯骥才以翔实资料回顾了自己在“新时期文学”中的文学之路，以及所取得的创作成就，并展示了那个时期作者与读者之间特殊的交往关系。作者自豪地写道：“那时一部作品发表激起的反响，对于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。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扑面而来。”读者的鼓励常让作家文思泉涌。那时，他一边手夹香烟，一边

忘情地投入写作，写至忘情处，常把烟蒂就势在桌面上摁灭……为了更及时地了解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馈，作家更是把门前的收报箱特意换了大箱，开箱时还得拿个篮子才行，不然箱子一打开，全箱的信就会散落一地……这种真诚而幽默的讲述，充分彰显出冯骥才关注现实、为人民而歌的文学创作观，也从一个侧面，让大众对“新时期文学”的盛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。

该书还是追缅同道中人的感想录。其中，既有早已故去的冰心、张贤亮、陆文夫，也有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“常青树”王蒙等人。无论是记事还是忆人，行云流水的文字，处处洋溢着作家真挚的情感、深沉的感喟。比如，写与张贤亮之间的交往，不徐不缓的追叙写得妙趣横生。有一年，作者与张贤亮一起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写作活动，岂料只剩一个月就要回国的时候，张贤亮的小说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在国内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。读者盛

赞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，文学评论界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。远在海外的张贤亮很快得到这些消息，作者担心张贤亮回国后再挨重批，于是打电话给王蒙探听讯息。王蒙听后，风趣地说：“告诉贤亮这家伙，愈批愈火，这下子他的小说畅销了，有大批稿费等着他回来领呢！”此事最后以巴金写了一篇评述性文章，才波澜不惊地到此为止。一波三折的故事，既透出作者与张贤亮等人惺惺相惜的同志之情，也可从中一窥“新时期文学”理性、宽容的生存环境。这种开放和包容，无论对身处其中的创作者，还是对当时的文学评论界，都提供了更大更广的施展空间。

在书中，冯骥才还回答了自己为什么要放下挚爱的文学创作，转向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。1979年，他写过一篇文章《作家的社会职责》。他认为，作家的社会职责是“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”。在这样的时代，“作家必须探索真理，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，代言于人



《激流中：1979—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》
冯骥才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民。”或许，正是因为有了“新时期文学”的历练和陶冶，赋予了作者一种责任担当和忧患意识，让他毅然腾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，热情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，并希望通过自己不遗余力的付出，拯救更多的民间文化“遗珠”，让中国文化在薪火相传中大放光彩。

该书记录的虽是文坛琐事，回顾的也大多是与读者及文学前辈的往来之情，但细微处考量的则是作者的良知和世道人心，小中见大的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与发展。抚今追昔，“新时期文学”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，定会在新时代随着中国文学不断向上的内驱力，随着中外文化的日益交流与融合，谱写出更加炫目的华章。